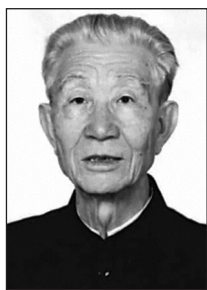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郑天翔

○郑易生 郑京生



郑天翔
学长

郑天翔，曾用名郑庭祥，1914年11月28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（原绥远省）凉城县。1935年7月至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学习。1936年初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北方左翼作家联盟，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7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。1938年调晋察冀边区工作，历任中共晋察冀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干事、科长，中共阜平县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，聂荣臻秘书，并增补为党的七大代表。1945年调绥蒙地区工作，历任中共塞北地委宣传部长、绥南行署专员兼绥南地委敌工部长、凉城县县长、凉城中心县县委书记、绥南工委副书记等职。1947年11月到晋绥党校学习。1948年任临汾西山（枕头地区）工作团团长，同年11月任华北局宣传部宣传科长。

1949年12月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团长，后历任中共包头市委副书记、市长、市委书记。1952年12月，调中共北京市委工作，历任市委委员兼秘书长，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主任，市委常委、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秘书长。1975年8月任北

京市建委副主任。1977年7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，同年11月兼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、政协北京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。1978年5月，历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、党组第一副书记、部长、党组书记。1983年6月，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党组书记。

2013年10月10日在京逝世，享年99岁。

抗日救亡思想的启蒙

1931年，郑天翔考入北平师大附中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震惊了郑天翔，校园里弥漫着因国土沦丧而极度愤懑的气氛。教师中不乏爱国、进步人士甚至共产党员，语文老师夏承泰在课堂上讲岳飞的“怒发冲冠”、杜甫的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，又给同学们介绍朝鲜遗民金调元所作的诗：“到底春归人未归，故乡风暴是耶非。覆巢燕子凄凉甚，更傍谁家门巷飞？”联系到东北沦陷，人民流离失所，夏老师不禁失声痛哭。同学们被夏老师声泪俱下的演讲所打动和感染，都哭起来，全场凄然。

还有一位对郑天翔成长产生积极影响的秦老师，他经常到秦老师那里聊天或借阅进步读物。郑天翔和一些进步同学交往也很密切，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之路和人生道路的选择。这个时期，他阅读了郭沫若的《女神》《棠棣之花》和高尔基等作家的《母亲》《铁流》《毁灭》等文学作品。他还参加支持北师大的南下救亡请愿

□ 人物剪影

及学校的进步文学活动，如办墙报、写文章、组织进步文化团体“露社”。

1934年高中毕业后，郑天翔到南京就读中央大学农学院。通过绥远旅京同学会中可靠的进步朋友，他借阅了布哈林的《唯物史观》、李季的《马克思传》，甚至英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哲学的贫困》等书籍。这时的郑天翔对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求知若渴，他关注着报刊上偶尔刊登的有关红军的消息，思索出路，向往革命。当从报上看到中共原最高领导人瞿秋白英勇就义的纪实报道后，极为震惊，并为共产党人的民族大义与浴血奋斗而感动，萌生了对共产党的崇敬与向往。他在军警遍地、特务横行的南京一刻也“不愿再待下去了”！他曾和几个好友一起秘密商量去投奔红军，后因红军离开根据地、无法获知去向而作罢。

在清华大学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

1935年8月，郑天翔毅然弃读南京中央大学，转而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（后转入哲学系）。入校不久，便爆发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

作为一名爱国学生，他积极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和“一二·一六”游行示威活动。在“一二·一六”示威游行中，他和同学郑季翘、赵继昌、赵正楹、牛荫冠、赵征夫（赵寿祯）、赵俪生、王瑶等人冲到了前面。这天，他与王士光一直在一起，虽然他们的脚走肿了，嗓子喊哑了，口干舌燥，饥肠辘辘，但斗志昂扬。

1936年清华“二二九”大搜捕时，军警抓住了学联负责人姚依林等三人。郑天翔和许多民先队员闻讯赶来，硬是将三人抢了回来。这天晚上，大批军警将全校学

生驱赶到体育馆内点名抓人，郑天翔看到同屋的王士光不在，知道他离校了，就冒名王士光，被放了出去。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学联负责人和民先骨干都是用这种办法蒙混过去，结果要抓的学生骨干一个也没抓到。

“三三一”抬棺游行时，赵德尊、李昌、杨学诚、王瑶、郑天翔、赵俪生等人都走在最前面。队伍行走到北池子南口就被打散围捕，赵德尊、王瑶等54人被抓。郑天翔和赵俪生被追捕截住，赵俪生巧妙与军警拉老乡关系，两人成功逃脱。之后，郑天翔还积极参加了“六一三”和“一二一二”大游行。

加入校园文学战线

郑天翔入读清华大学后，先报名加入了世界语协会和清华文学会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后，校园内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，郑天翔愈加“不安分”了。

1935年底，赵德尊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，公开的组织名称是“国防文艺社”“新地社”，负责人先后是魏东明与赵德尊。1936年2月，郑天翔经李秉忱介绍加入左联，担任一个小组长，同组有郑季翘、赵继昌等。他还与赵俪生办《浮世绘》副刊，并加入了文艺青年救国会清华分会。2月下旬，经李昌介绍，郑天翔加入了民先，与艾光增、何礼编为一组，负责新文学通信联络工作。

郑天翔先后担任学生会创办的《清华周刊》哲学栏编辑（王瑶为总编辑）和《清华副刊》（文学）编辑（与张新铭合编）；同时也做过一个时期的《新风》《新地》《新文字通讯》《世界日报》《世界语之光》《世界语副刊》《十一级

新文学》等的编辑工作。

4月底，方琦德负责清华左联支部工作，成员有郑天翔、赵俪生、王瑶等。自加入左联后，郑天翔不仅是参加或发起组织进步社团的积极分子，而且又是“身兼数职”的众多文学刊物的编辑。

在郑天翔编辑的报刊中，《清华周刊》的工作量最大，每期的文字量为十几万字。每期周刊从编辑、打印、校对，到印刷成刊，郑天翔要从清华园到北平城内厂桥的大学出版社往返几个来回。他虽辛苦，但也乐在其中。《清华周刊》抗日救亡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，也许是出于少招麻烦的考虑，校方对学生会的一些事只是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才使刊物得以暂时生存。

而《清华副刊》就显得更加张扬一些。王瑶为副刊总编，郑天翔与张新铭为编辑。当时，郑天翔与王瑶、赵俪生三人一直是关系要好的同学，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议，要把《清华副刊》办成集文学性、科学性和革命性于一体的进步刊物，以唤起广大青年和民众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伟大

斗争中来。

在编辑《清华副刊》时，郑天翔发起开辟了《我的家乡》专栏，发动同学们撰写自己家乡的文章，通过对家乡的描写，传播中华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，激发爱家、爱国、爱国的热情。在办刊过程中，郑天翔和同学们也遇到很大困难和阻力。一度《国防文学》办刊效果欠佳，刊物进不了市场，而没有市场的刊物就没有影响。他们通过改进办刊方式、变换刊名、增加栏目、加大宣传力度等一系列措施，并将原《国防文学》刊名改为《新地》文学月刊，很快打开了市场，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1936年10月19日，文坛巨星鲁迅逝世。清华大学文学院准备在10月24日下午一点半组织全校师生在同方部举行追悼大会。原打算邀请著名教授写挽联，找了几位先生，皆因各种原因没成功。郑天翔和赵俪生情急之下，临开会前自编自写了大会的挽联：

上联：树新兴文艺之教育，教育青年，教育大众。

下联：为社会解放而战斗，战斗到底，战斗到死。

11月，郑天翔因从事抗日救亡和社团活动而旷课很多，受到学校警告处分。但他不受影响，又忙乎起清华大学参加纪念“一二·九”一周年集会游行的事。

组建绥远地区青年学生 抗日团体

原北平绥远平津同乡会和绥远旅平同乡会的组成人员，大部分是国民党员或已经做了国民党市、县官员的学生。在学校里，



2001年12月8日，郑天翔（前排右3）参加部分清华地下党老同志回校座谈会

□ 人物剪影

他们既当学生，又做国民党特务，专行刺探各院校共产党地下组织情报，破坏学生运动，陷害进步学生之能事。为了扭转这种局势，郑天翔与乔培新等同学经过艰苦工作和斗争，于1936年11月14日发起组织召开绥远旅平同学会改组大会（到会60多人），组织了新绥远社，出版了刊物《新绥远》（一期），并支持成立绥远抗战救国后援会。参加会议的同学有一大批北平各院校绥远籍的进步学生，有的是民先队员，有的则是共产党员。在郑天翔和乔培新的领导下，绥远旅平同学会成为一个抗日救亡的进步学生组织。

11月17日至22日，受北平民先总队部委派，郑天翔秘密到归绥市发展组建民先绥远省队部，并介绍与北平民先总部接上关系。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绥远队部正式成立会议上，大家推选出了队长等负责人，参加会议的各校学生则分别担任本校的民先负责人。

由于许多更重要的工作需要郑天翔去做，他没有顾得上回凉城老家，便和几个绥远籍的民先骨干，星夜踏上东去北平的列车。之后，在民先总部的领导下，绥远民先组织很快成立并发展壮大，成为绥远省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有生力量。

“七七”事变前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绥远队部已经发展到了100多人，全国抗战爆发后，一大批民先骨干奔赴抗日前线。

自归绥回来后，郑天翔一直思考能否将北平各大院校多个进步团体联合起来，以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。绥远抗战爆发后，他就开始从“同学会”“同乡会”着手搞联合。11月下旬，他与武新宇、裴鸿昌（裴梦飞）、郑季翘、杜润生等组织晋

绥旅平青年救国会（又称晋绥旅平同学救国会）。不久，与裴鸿昌、杜润生、康世恩等同学，参与组织成立西北旅平青年救国会，将在北平的绥远、山西、察哈尔籍的大部分同学联合起来。

终于找到组织，加入中国共产党

自从郑天翔在南京中央大学萌生投奔红军的想法起，他就日思夜想地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到了北平后，他一直关注、寻找着共产党，几经努力，终于找到了组织，原来一直领导他做社团工作的赵德尊就是共产党员。1936年11月，郑天翔找到赵德尊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2月中旬，北平学委秘书处负责人赵德尊介绍郑天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后，交给郑天翔的任务是在北平学委秘书处搞印刷和保管，直接归学委领导。赵交给郑一个绿色帆布箱子，里面是油印机和文件，郑天翔把箱子带回宿舍。一天晚上，赵德尊来到郑天翔的宿舍，拿出纸笔工具刻好蜡板后，郑天翔印。北平学委的刊物《生活通讯》也就是一张蜡纸的篇幅，大致半月一期。印出来后叠成小册子由赵德尊带走。印刷站的工作很繁重也很危险，每次要销毁蜡板，经常变换印刷地点，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工作，仅与赵德尊单线联系。又过了几天，赵德尊将赵正楹介绍给郑天翔，此后由赵正楹作为交通员，由他取走印刷物，并领导工作。

入党之后，郑天翔在给远在齐鲁大学的恋人宋汀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书是念不成了，我也早已决心不要这张文凭了。”他不能与恋人分享入党的喜悦，只能用言外之意的话表达自己的情感。之后不久，他收到宋汀的来信，从字里行间他

看出宋汀也向党迈出了一步，他兴奋地写道：“你那个事我真高兴。这一下非同小可，我们要互贺一番。”两个从绥远家乡一同走出、共同追求革命的年轻人，这样表达着他们的激情和浪漫。

紧急关头销毁秘密文件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军队和各个机构、组织都紧急撤离，北平城里一片恐怖和混乱，郑天翔一时也与组织失去联系。8月上旬，为了把藏在清华善斋锅炉房的一包秘密文件紧急销毁，他从城内赶回清华园，此时清华园已经“人去园空”一片萧条。郑天翔的“秘密”没有瞒过帮

他存东西的工友，他递给郑天翔一盒火柴说：“日本人来了，学校迁了，我看你那点东西也用处不大了，快快烧掉吧。”郑天翔把牛皮纸袋里所有的文件和党员名单档案拿到地下室，一页一页拆开付之一炬。后来郑天翔每次说到冒险销毁党员名单这件事，总是感激地说：“这个不知姓名的工友是个好人，一个善良的人。”

1937年7月底北平沦陷后，郑天翔按照党组织的指示，经天津、烟台到达济南，取道西安，奔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

（转自《唤起全民族的抗战》，北京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12月出版，有删节）

熊式一：“中国莎士比亚”的传奇人生

○仇广宇



一九三五年
熊式一在伦敦，约

1991年9月15日傍晚时分，北医三院内，一个个头不高、身材瘦小的老人躺在病床上。他已被医生宣布病危，但看起来依然有一丝生命迹象。偶尔，他会用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，含糊地吐出“狗屎”这样的诅咒话。最终，这一点生命迹象，没能抵过死神的威力，他就这样去世了。他原本是回到北京探亲，只是没想到在这里

离世。

外人并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姓名，更不知道他有过辉煌过去。实际上，他是20世纪30年代海外最知名的中国作家熊式一。他的名字，一度与著名作家林语堂并列称为“林熊”。1934年，熊式一创作的英文话剧《王宝川》火爆全球，从伦敦小剧场演到美国百老汇，连演数百场，《纽约时报》因此将他誉为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。他的小说《天桥》也曾被翻译成多个语种，畅销欧美各国。

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位“中国莎士比亚”在中国大陆没有太大的名气。直到2023年，名为《熊式一：消失的“中国莎士比亚”》的传记的出版，才让这位传奇剧作家的人生故事重新呈现在更多中国读者的眼前。用这本传记的作者郑达的话